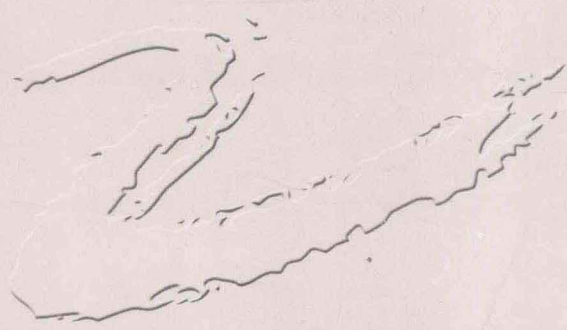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李光地

LI GUANGDI

许苏民◎著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 大家精要

## 李光地

许苏民◎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光地/许苏民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0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4011-0

I. ①李… II. ①许… III. ①李光地(1642~1718)  
—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9078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沈正德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李光地**

LIGUANGDI

许苏民◎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站: <http://www.yneph.com>

(650034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ISBN 978-7-5415-4011-0

定价: 16.80 元

# 目 录

|                  |     |
|------------------|-----|
| 第1章 李光地的生平事迹     | 001 |
| 一、青少年时代          | 002 |
| 二、仕宦历程中的主要事迹     | 013 |
| 三、康熙帝与李光地的“君臣际合” | 047 |
| 第2章 李光地的思想       | 059 |
| 一、学术主张           | 059 |
| 二、理学思想           | 069 |
| 三、易学思想           | 087 |
| 四、政治思想           | 101 |
| 五、科学思想           | 120 |
| 六、宗教思想           | 126 |
| 第3章 李光地的历史地位     | 130 |
| 一、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 130 |
| 二、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 135 |



|                |     |
|----------------|-----|
| 三、长期受到非议和冷遇的原因 | 141 |
|----------------|-----|

## 附

|    |     |
|----|-----|
| 年谱 | 152 |
|----|-----|

|      |     |
|------|-----|
| 主要著作 | 154 |
|------|-----|



002

# 第 1 章

## 李光地的生平事迹

李光地  
LI GUANGDI

001

李光地（1642 ~ 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使、兵部侍郎、顺天学政、工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兼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职。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于北京，享年 77 岁，谥文贞，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同时代的学者尊称其为安溪先生，或尊称其为安溪李相国。

李光地是清朝康熙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平息“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治理水患、澄清吏治、奖掖学术、发展教育、选拔人才等实际事功方面，特别是在为清政府奠定思想统治的重心方面，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康熙时代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也曲折地反映了 17 世纪至 18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向。

李光地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康熙时代的一个缩影，他一生的作为，与康熙时代的全部政治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作为一位“在朝”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又与“在野”的思想家和社会思潮有着极其微妙的互动关系。

## 一、青少年时代

明朝崇祯十五年九月初六日（1642年9月29日），李光地出生于福建安溪。中国素有“天人感应”的说法，认为大凡伟人杰士出生，天地之间定有非常之兆出现。李光地出生那年，其母吴氏住在娘家安溪华地乡。据说光地出生时，一声巨雷，闪电照得山川如同白昼，满天光华照耀华地。这当然是一种巧合，但光地之名即由此而来。李光地出生那年，明末农民战争的烽火已燃遍中原。李光地出生后一年零六个月，即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就攻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身亡。同年4月，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是为清朝顺治元年。



002

### 湖李家族

世居安溪湖头感化里的李氏家族，是当地的“甲族大家”。据李光地说，到他这一代时，“吾族聚居于此，十有余世；根衍枝繁，人丁众膨”。这一家族的精神，既由于当时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影响而别具某些新的特点；又因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构的制约，在总体上表现出颇为典型的传统文化精神。

安溪属泉州府。早在宋代，泉州就是一个很大的通商口岸，可与西方的亚历山大港相比，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泉州出发；海外来的商人、传教士、学者亦在泉州登岸。明代泉州的海上贸易也很发达，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当地很多人都是以从事海上贸易为生的。许多江浙的商人也纷纷到闽南漳泉一带做果品生意，往往荔枝才开花时，江浙客商就到闽南乡间看树估价订合同。可见当地的经济已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为交

换而生产的商品经济的性质。安溪距泉州 105 华里，四乡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湖头距安溪仅 60 华里，号称“小泉州”，当地人多亦农、亦工、亦商；眼界比较开阔，见闻亦多。

李光地的八世祖朴庵公李森，是明朝正统、天顺年间的人，有“田数万亩，粟数万钟；计山百区，出木数千万章，憧千指，益尽力居积”。可见他既是大农场主，又是大木材商人。明代中叶以后，“本富益少，末富愈多”——靠农业致富的愈来愈少，靠工商致富的愈来愈多。李光地的祖父念次公李先春就是一个“末富”的典型，主要从事采矿业和炼铁业，靠工商致富。

湖李家族发达以后，努力博得“尚义”的名声。天顺年间，李森捐粟五千石赈济苏州灾民，又捐粟三千石支援边塞驻军。后来明武宗也表彰李森“尚义”。李森闻讯后，跋涉七千余里，进京谢恩，受到皇帝的设酒招待。

中国传统社会，国是家的延伸。培养子孙读书做官，用儒家的话来说，是“兼济天下”；但从家族本身来说，则根源于保护其切身利益的需要。作为地方上的“甲族大家”，仅仅“富”是不够的，还要“贵”起来，才能免遭地方官吏的欺侮和敲诈勒索。在李光地已经进了翰林院当庶吉士的时候，泉州知府竟然不买账，胆敢向李家强行索取一具可以保持尸体不腐烂的油杉木做的棺材（当时值五百两银子）。当然还不止这一件事，用李光地的话来说：“予初为庶常，家中府县官作贱家君无所不至。”家族要对抗官府勒索，唯一的办法是培养子弟当官，最好是当大官，以此作为家族的政治保护伞。因此，培养子孙读书做官，也是李氏家族的传统。

李森以后，李氏家族中多有循着读书做官的途径而显耀于国者。自明朝景泰至嘉靖、万历、崇祯年间，李氏家族中考取举人的有李煜、李澜、李道先、李懋桧、李祯、李宗润、李

栻、李光升、李仕亨、李凤鸣、李日烨、李继祚、李重灿、李光龙等，其中考中进士的有李懋桧、李栻、李凤鸣、李光龙。李懋桧官至太常寺卿，李凤鸣官至户部郎中，李光龙官至翰林院检讨，中举的李道先任常德知府，李继祚任广东惠潮副使，李重灿任儋州知府。李光地曾作《书家谱传》，说：“诸公在隆（庆）、万（历）间，皆一时之选也。虽奉常善、扬祖德，然诸公靡然共声，可以观仁矣。盖吾祖之仁洽于乡、显于国，斯是以不可掩也。”

同是李森的子孙，李光地的祖父这一房的家境就不景气，念次公李先春由于忙于“居积起家”，终身不仕。李光地的父亲惟念公李兆庆，原是打算走读书做官的路的，但直到清朝顺治十八年才考得了一个“贡生”的头衔，取得了到北京的国子监去读书的资格。国子监的学生可以得官，也可以再考举人、进士而得官，可是李兆庆去北京读了一两年书就回来了，大概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以“监生”的资格在京城当个受气的小官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回家培养儿子要紧。以往李氏家族做的是明朝的官，如果到了清朝没人做官，那就很难在地方上维持其“甲族大家”的地位了。

地方上的“甲族大家”，不仅要对付官，而且要对抗“匪”。要对抗“匪”，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所以湖李家族又有尚武的传统，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精神的表现。李光地的八世祖李森曾令家童千人练兵习武，主要用以合族自保；同时，又曾亲率这支武装配合王阳明率领的官军平定福建和江西，因此得了一个漳州九龙岭巡检的官职，后来又任安溪源口巡检等官。李光地的祖父李先春亦仿效李森，“选民壮五百余”，练兵习武，亦主要用以合族自保。在清初，李氏家族的武器装备，不仅有大刀长矛，还有火炮。

从李森到李先春，可见李氏家族的传统是贵利尚义，亦文亦武：既广开财源，尽力居积；又急公好义，赈济穷困。既遵

循儒家伦理修身齐家，培养子孙读书做官；又练兵习武，绥靖地方。这一家族的精神，除了不排斥“末富”的“贵利”精神与传统文化不合外，其他诸方面都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基本精神。

## 少年历劫

顺治三年（1646）八月，清军进攻福建，南明隆武政权的军队弃关不守，清军从容越过天险仙霞关，八闽望风瓦解，这年李光地才五岁。

然而在顺治年间，清政府并没有真正确立起对福建全省的统治。一方面，固然有明王朝的残余势力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进行抗清斗争；但另一方面，在历史改朝换代之际，新王朝的统治尚未在偏远地区建立的时候，又正是地方割据势力作威作福的难得机遇，于是藏龙卧虎一起跑了出来，俨然成为一方的土皇帝。顺治七年闽浙总督陈锦奏称：闽浙一带“自鼎革后从未归化……地方虽入我版图，其实……民非我民而土非我土”。

李光地童年时代，闽南一带有林日盛一伙占山为王。这伙人不是农民起义，也不是抗清武装，而是残民以逞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在漳州、泉州一带的水陆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勒索过往行人。地方乡绅和百姓如能满足其索求，自可相安无事，否则就肆意侵害。仗着“狡兔三窟”、山高路险、人多势众，官军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顺治十二年（1655）夏六月，林日盛将包括李光地在内的李氏12人掳入山寨，特别是以年仅14岁的李光地作为人质，以此要挟索取巨额赎金。关于此事的经过，李光地曾作诗《仲父破贼拔家难》述其梗概。事情发生后，李光地的祖父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把家人赎回，可是林日盛还嫌钱少，不肯放人。祖父因此忧愤而逝。正当光地的父亲束手无策的时候，伯父李

日爆自远道奔回。李日爆决定先礼后兵，只身前往山寨与林日盛交涉，但林日盛为了勒索更多的钱财，就是不肯放人。于是，李日爆只好诉诸武力。当时李光地家的仆人、佣工、佃户人数至少在百人以上，他们愿为营救李氏家人而拼命：“乘夜劫其巢，巢险雨又漫。百人造峰下，廿八为登先，雾重晨昏晦，泥深沚且颠。既知入死地，大呼撼贼盘。”林日盛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杀来了多少人马，仓惶丢下家眷逃往另一巢穴，此次被救出的只有李日炬等四人，李光地等八人还被囚禁在另一个山头上。林日盛遭此袭击，十分恼怒，要与李日爆决一死战。李日爆既俘获了林日盛的家眷，于是便“且战且议赎，又许归其媛”。而林日盛不吃这一套，连他心爱的小老婆也不要了：“贼云本无家，不足相准权。”随后又是一场恶战：“尝以十九人，父伯同孤墩，千贼凌晓至，势无复生存。”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统率千名贼寇来与李日爆作战的将领突然被一名部下砍了脑袋，乌合之众顿时乱了套，李日爆乘乱追击。经过大小百战，最后才将李光地等八人营救出来。

从顺治十二年六月被抓到第二年七月获救，李光地被扣作人质约十三个月之久。据《安溪县志》载，在此期间，林日盛几次要杀李光地，光地“终不惧，间即取书读，贼大奇之”。

## 求学生涯

传统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刺激着下层社会的人们走读书仕进的道路。李光地之所以能够“位极人臣”，是他从小刻苦求学的结果；同时，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与当时学界氛围的熏陶分不开的。

论李光地的天赋，后人的谀辞与他自己的自述互相矛盾，而以自述较为真实可信。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说光

地5岁入塾时，就已经能背诵很多书，而且“善属对，矢口惊人”，乃至“塾师弗能教”。《李文贞公年谱》说光地7岁即能赋诗，9岁读《离骚》，“成诵即知大意”；12岁时，每日能写五篇作文；13岁毕诵群经。《清史稿》也说李光地“幼颖异”。照这些说法，李光地的天赋很高，简直就是神童。而李光地的自述就不同了，他说“某天资极钝”。他的四家叔也说：“厚庵少时天资平常得很。”

清朝仍然是以程朱的性理之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李光地的父亲李兆庆尊崇朱熹，希望李光地也能像他那样“笃嗜正学”，因而为光地购置了“五经”、《性理大全》、明代理学名家晋江人蔡清的《四书蒙引》和《易经蒙引》、林希元的《易经存疑》等著作，供李光地朝夕诵读。李光地边读书，边作笔记，18岁时纂《性理》一部，19岁时纂《四书解》一部。这里所谓“纂”，就是摘录前人著作中的精华。李光地曾自述其读书法，他说：“读书要搜根，搜根便不会忘。将那一部书分类纂过，又随章札记，复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记得。”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提纲挈领、融会贯通的读书法。

福建虽然有朱子学的传统，但在明代中叶以后，也已形成了一种厌弃朱子学的风气。明代中叶，泉州出了一个风云全国的大异端思想家李贽；到了明末，漳浦又出了一个服膺阳明学的大学者黄道周。这二人足以为阳明学大张旗帜。李光地年轻时安溪一带的学术氛围亦基本上为王学所笼罩。晚年李光地回忆说：“明末闽中学者饮酒读史，崇尚李卓吾书，举国若狂。”在许多明朝人看来，宋朝之所以被蒙古人所灭亡，都是朱熹学说坏了事。但在清初人看来，明朝之所以被满族人灭亡，又是王阳明学说坏了事。李光地年轻时已是清初，为什么安溪的长老们还信奉阳明学呢？这些长老们是何许人？这得从南明隆武政权说起。

清军占领南京后，曾任崇祯皇帝经筵讲官、弘光皇帝礼部

尚书的黄道周，拥戴唐王（即隆武皇帝）于浙江。黄道周因掌握有重兵的投降派郑芝龙排挤，不得不亲赴江西募义军抗清，结果兵败被俘，壮烈就义。清军攻入浙江，隆武帝只得移都福州。据安溪民间传说，清军攻入福建后，李光地的从兄、崇祯皇帝的翰林院检讨李光龙接应隆武皇帝朱聿键到安溪，隐居于湖头妙峰山寺，化名“南方僧”。同时来的还有一些明朝的遗臣，大多是一些信奉阳明学的书生，他们或许就是光地一再提起的“长老”。从散见于李光地著作中的蛛丝马迹看，李光地的上辈人和年轻的李光地是与残明遗臣们多有接触的。李光地曾回忆说，“癸未进士光龙先兄明末避乱于寒舍”，曾给光地讲《周易》。又据《年谱》，光地曾读书于妙峰山，这妙峰山正是遗臣隐居的处所。

光地自云：“二十一至二十五岁看陆子静、王阳明集及诸杂书。”看陆王之书，无疑是受残明遗臣们的影响。平心而论，陆王学说亦有其优长之处。如梁启超所说：“鲁王、唐王在浙闽，永历帝在两广云南，实际上不过几十位白面书生——如黄石斋（道周）、钱忠介、张苍水、王完勋、瞿式耜、陈文忠、张文烈……诸贤在那里发动主持……虽终归失败，究竟也把残局支撑十几年，成绩也算可观了。……我们应该从这里头认取阳明学派的价值，因为这些学者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这从一个方面道出了阳明学的价值。阳明学说，又是一种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学说，它反对程朱学束缚身心，提倡率真进取的学风。李光地之所以后来对程朱学说作了许多修正，并且直到晚年还坚持王阳明的某些观点，与他早年读王阳明的著作是大有关系的。

李光地之治易学，亦是受隐居的遗臣们的影响。李光地的家族中人多治《尚书》，只有族叔李偕芳“治易精熟”。比李光地大 27 岁的李光龙“从族叔偕芳受《易》”，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时，主考官说他“易学纯深”。当然，最有影响

的易学大家还是南明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他“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精通易学和天文历数，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等著作，“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道周学问，最受遗老推崇。光地 20 岁至 25 岁之间除了读陆王之书外，还读“诸难书”。当时天下的难书，无过于道周的易学著作了。李光地后来曾特别提到黄道周的《三易洞玑》是何等艰深繁难。由于受黄道周的思想影响，因而光地不以朱熹的《易》注为然，“觉得朱子注无甚意味”。同时，光地亦没有局限于一家之说，而是“于诸家同异，条分缕析，用为熟研覃思之地”。

李光地在钻研《周易》的同时，还研读了道教经典《参同契》、《悟真篇》，佛教的《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华严经》。在此期间，亦曾为《尚书·洪范》作注，著《尚书补义》等。此外，李光地还注重研究天文历算之学，24 岁辑《历象要义》，并在书末附上自己写的《历论八篇》。25 岁那年夏天，他又集中精力对律吕之学做了研究。

李光地年轻时，也曾听老人们讲历史，但却收获不大。他后来回忆说：“某十八九时，经书外才看一部《性理》，闻长老援古证今，茫不知其端。然觉得其言间有不联续处，又有违碍道理处。”《二十四史》本是一部“相斫书”，与教人正心诚意的《性理》当然是两回事。据他自己所说，他是在 40 岁以后才对读历史书产生兴趣的，那时已是朝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读点历史的时候了。

李光地是沿着秀才、举人、进士、庶吉士的“正途出身”的阶梯，一步步地进入清王朝的统治中枢的。康熙二年（1663），李光地 22 岁，考取秀才。五年秋考中举人，九年中进士，十年至十二年在翰林院庶常馆深造。在这期间，他得到寓居北京的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指教。

康熙十年三月，李光地将所作《历论八篇》送请卫既齐指

教，卫既齐将其拿给顾炎武看，顾炎武看后称赞道：“元人之文也！谁为为之者？幸一识之。”于是李光地得以会见顾炎武。顾炎武很谦逊地对李光地说：“历之是否吾不能知，论文字则元人之文也。”光地问：“以先生之博学，何谓不能知历？”顾炎武回答说：“吾于经史虽略能记诵，其实都是零碎工夫，至历律礼乐之类，整片稽考便不耐烦，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顾炎武给李光地讲授了音韵学知识。

光地后来回忆此次会见，将顾炎武与同时代的大天文学家梅文鼎作了比较，说：“梅定九了然于心，了然于手，却不能了然于口；宁人（顾炎武）则善谈论，其自讼处实读书要诀也。”又说：“使某不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

李光地在翰林院学习期间，还曾前往民间拜残明遗老孙奇逢为师。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又号夏峰、北海，直隶容城人，以侠义闻名天下。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诬下狱时，一般人多惧祸引避，唯孙奇逢与其友鹿继善倾身营救。清军入关后，孙奇逢亲自督率子弟，调和官绅固守容城，清兵久攻不下而去。到清政府的统治地位确立后，才不得不隐居讲学。李光地听说孙奇逢尚且健在，年虽八十而论道著书不息，乃欣然与左都御史魏象枢前往拜见请教。

李光地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望其神气，清健如五六十岁人，独耳偏塞。然有所问叩，辄酬酢如应响，盖所谓能以目听者，古之真人欤！”康熙十二年（1673），李光地告假回乡时，曾去向孙奇逢辞行，孙老向光地赠书，并说：“某平生师友，尽在闽中。”孙奇逢的学问，早年得力于阳明心学，晚年则认为程朱陆王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当取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他的思想，对于李光地一生的治学思路影响极大。

## 性格特征

对于杰出的历史人物，后人爱加以神化。在道学盛行的时代，人们更爱把杰出人物打扮成一副道学面孔。《李文贞公年谱》说李光地 13 岁时，“锋锷敛戢，循循恭谨，侍坐于长老，日暮不敢就宴”。又说李光地 18 岁时，“敛衣冠，谨坐起，非程朱不敢言”。把 13 岁的李光地说成如同泥塑木头人，把 18 岁的李光地说得道貌岸然，这些说法都未可尽信。

李兆庆笃信程朱，家教严格，是事实；李光地读书专心，也是事实。但如果说他从小就被程朱理学泯灭了童心，年轻时就没有一点英风豪气，整天摆道学架子，头脑僵化得“非程朱不敢言”，那么到头来，他只能是个蠢材、庸才，不可能有任何建树。与此相反，李光地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历史人物，与时代造就他的独特品格分不开。

受当时安溪长老所崇信的王阳明学说的影响，李光地认为天地之性是“活泼泼的”，人具天地之性也应该是“活泼泼的”。所以他后来教育家族中的子弟说：“子弟生性廓落不妨，但当有耑（专）心之处便好。”他要求子弟读书要专心，但并不主张束缚年轻人的个性。这很像是王阳明的说法。

李光地不迷信圣贤，这也是明清之际的文化氛围造成的。李光地直到晚年也不是“非程朱不敢言”，何况年轻气盛之时？《榕村语录》是弟子们所记录的他的言论，他跟弟子们在一起，屡屡讲到尧、舜、周公这些大圣人们的缺点，讲孔夫子与子思父子都曾闹离婚，讲朱熹徇私情为大奸臣张邦昌作行状，甚至还讲到王阳明怕老婆却能成大事：孔北海承泽极恶阳明学术，尝举阳明与学徒讲论。其夫人忽闹出，掀其几案，抛其节帙，曰：“诸君勿信此老厮诳！”因枚数其平居奸私事。门人窃窥阳明，颜色和霁，如不闻者。久之，夫人入，阳明徐整书案，复

理前论，若无中间一段事者。或以为非人情，某曰：“恐即此已足以擒宁王矣。”北海为之失笑。

李光地又赞阳明为“贤豪”、“才气好”，平定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时，受敌突然袭击，临变不惊，“驱市人而战”。从李光地议论往昔圣贤的这些言论看，他简直没有一点道学的架子，思想极开通，极明达，性格何等爽朗；与弟子们谈笑风生，何等融洽。

李光地崇仰“不畏强御”的侠义精神，其文集中有一篇《书鹿太公家传后》的文章，其中虽未言及他与鹿继善的交往，但由此文可推知他在拜孙奇逢为师时，一定还结识了孙老的至友鹿继善。李光地在文章中对鹿继善不畏凶险营救东林党人的侠义品格大加褒扬。有人说，鹿继善终生不仕，不在其位却谋其事，不是违背了圣贤的中庸之道吗？李光地回答说，在权奸当道、国事危殆的时刻，即使是“一耕夫”亦有过问国事的责任。鹿继善“大义慨然……非逐名矫节，而无作于圣贤也！”李光地还驳斥了汉代班固所谓“侠者……赴难死党而不轨于义，无益于公”的说法，认为“东京之季，倚乎公义矣”！而鹿继善的侠义品格，正是对东汉清议派知识分子的精神的继承。

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有一次，左都御史魏象枢退朝后面带喜色地告诉光地：“当初皇上叫推荐人才，福建总督范承谟推荐了一个曾经受过令长鞭打的董汉策，今天受到了科道官的弹劾。”李光地不同意魏象枢这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说：“令长黑白不分，由来已久。读书人受到地方上令长的羞辱的事多着呢，岂可一概而论？如果令长是贪赃枉法的坏官，遭他鞭打的是‘不畏强御’的读书人，究竟是打人的人不对呢，还是被打的人不对呢？纵然这位读书人年轻时不谨慎而有过错，后来改正了，也不应该咎其既往。”魏象枢听了，对李光地的过人见识大为叹服。李光地对社会基层的情况太熟悉了。他知道，当